



德性与民主

——与现代新儒家谈政治哲学

吴圣正◎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圣正，男，山东淄博人，1967年12月出生。1987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在小学、中学担任教师12年。1999年自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7月至今在山东师范大学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及政治哲学研究。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德性与民主

——与现代新儒家谈政治哲学

吴圣正◎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性与民主:与现代新儒家谈政治哲学 / 吴圣正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27-04260-0

I. 德… II. 吴… III. 新儒学—政治哲学—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6185号

德性与民主——与现代新儒家谈政治哲学

吴圣正 著

责任编辑 杨旭东 康景堂

装帧设计 王 莉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60-0/B·13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言

中国在近代衰落了，成了西方列强的盘中餐、俎上肉。中国何以衰落？五四运动的思想精英们终于发现问题出在中国缺乏科学与民主上。前者是知识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知识可以直接学习，但制度的建立则需要观念的支撑。在此情形下，中国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民主、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就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仁人志士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现代新儒家是这些仁人志士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他们试图从中国原生态的文化中“开出”类似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返本开新”，即由儒家德性开出现代民主。但是，现代新儒家的政治论说却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西方式的思维曲解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以主观的愿望代替客观的事实，以认识上的规律代替社会历史的规律等。本书对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作了梳理，并着重从德性与自由的关系、德性与民主的关系、德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并阐发了笔者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见解。作者的见解如何，还有待读者读完后做出自己的评价。

作 者

2009年8月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 001

第一章 “德性与民主”问题的提出

一、文化危机与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 013

（一）“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 014

（二）现代新儒家的产生 / 020

二、“返本开新”的文化使命 / 027

（一）现代新儒家的“本”与“新” / 028

（二）“返本开新”——从自发到自觉 / 036

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 048

（一）儒学的三期发展 / 049

（二）坚持文化的“本位性” / 052

（三）道统论与现代新儒学 / 055

第二章 德性论说

一、“德性”界说 / 060

（一）德性与道德 / 061

(二) 道德与伦理 / 069

(三) 德性在现代新儒家中的含义 / 070

二、从人性论到心性修养论 / 073

(一) 先秦人性论与心性修养论 / 073

(二) 宋明心性论与心性修养论 / 084

三、从心性论到道德形而上学 / 091

(一) 从宋明心性论到现代新儒家心性论 / 091

(二) 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到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 / 100

第三章 德性与自由

一、自由与自由主义 / 128

(一) 理智的自由 / 129

(二) 道德的自由 / 134

(三) 政治的自由 / 139

(四) 自由主义 / 143

二、现代新儒家的自由观 / 149

(一) 从道德的主体自由到政治的主体自由 / 149

(二) 从内在自由到外在自由 / 160

(三) 从心的自由到身的自由 / 164

三、德性与自由关系的再分析 / 167

(一)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 169

(二) 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 / 175

(三) 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 / 180

第四章 德性与民主

一、民主——作为精神与作为制度 / 187

(一) 作为制度的民主 / 188

(二) 作为精神的民主 / 196

二、现代新儒家的德性民主观 / 199

(一) 由德性治道到民主政道 / 199

(二) 道德理性下的民主政治 / 211

(三) 心的文化中的民主精神 / 218

三、从儒家德性到现代民主的疑难 / 226

(一) 德性坎陷民主的虚玄 / 226

(二) 儒家德性与现代民主精神的扞格 / 244

第五章 德性与政治理性

一、人类的两种基本理性 / 256

(一) 理性的历史 / 256

(二) 两种理性 / 269

二、政治中的两种理性 / 277

(一) 政治理性与政治理性主义 / 278

(二) 政治中的工具理性 / 280

(三) 政治中的价值理性 / 292

三、儒家德性与现代政治 / 304

(一) 德性与价值理性 / 304

(二) 儒家德性观对现代政治的积极意义 / 306

主要参考文献

一、现代新儒家原著 / 323

二、古代经典 / 325

三、外文译著 / 326

四、其他论著 / 331

五、论文 / 336

后 记 / 340

导 论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鸦片战争和 50 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长期累积起来的内忧外患终于爆发出来,并自此不断加深。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开始了探求民族富强和民族救亡之路的艰辛历程。这一历程表现在社会政治运动上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政治运动背后的则是思想运动,也就是中国人在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

反观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的民族富强与民族救亡之路,无论表现在政治运动上还是表现在思想运动上,都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政治与思想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民主,后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怎样实现民主。就前一阶段“中国要不要民主”而言,大体有三大派别,它们是顽固派、改良派和革命派。顽固派以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和君主专制为宗旨,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仅从“实用”主义角度主张有限度地利用西方的科技和制度的文明成果。改良派主张在保留中国传统君主制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政治与社会改革,比如制定宪法、建立议

会、对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进行西方式的改革等。革命派以推翻专制主义皇权统治和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为目标，并进行了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以推翻清政府为标志）并不意味着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成功，其后种种舆论上和政治上的复辟运动，足以说明顽固势力的强大、人们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游移徘徊。随着军阀统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开始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从思想观念、文化知识到政治制度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中国民族富强与民族救亡的目的就永远无法实现。于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爆发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思想运动，它尽管没有直接导致政治运动，但其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革命都无不深受它的影响。五四运动是对其前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总结，它使其前“中国要不要民主”这一思想和政治运动的核心问题尘埃落定：中国必须走民主与科学的道路。此后，无论在思想运动还是政治运动中再没有人公开主张走专制主义的复辟道路。至此，中国思想与政治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了——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主，以及实现什么样的民主。

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这一问题，公认的有三派主张，即西化派、激进派和保守派。西化派主张彻底地反传统，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激进派又被称为“苏俄派”或“马列派”，它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样板，主张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派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前革命派进一步发展与分化的结果，它们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并都在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两派作为“革

命派”都曾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社会理论上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各民族的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古代文化因而是落后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现代文化因而是先进文化。因此，中国要实现民族富强与民族救亡从而不被社会历史所淘汰，就必须用西方（苏俄）的先进文化代替中国传统的“落后”文化。保守派在社会文化观上与上述两派不同，他们认为，中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文化，二者不存在优与劣之分和先进与落后之分，因此中国未来的文化以至于政治可以走中西调和的路子。三派主张并非界限清晰，在不同的问题上实际存在着彼此重合与一致的地方。比如，西化派与激进派在政治观上不同，但在基本的文化观上是一致的；保守派在文化观上与前二者不同，但在政治观上则与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三派之间，西化派与激进派都反对保守派的文化观，而保守派和西化派都反对激进派的政治观，因此它们之中最为对立的是激进派与保守派。

保守派即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家的前身。而保守派的思想又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某些在文化观上具有保守倾向的人物如章太炎等。因此，现代新儒家的发展有两条线索可寻：其一：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唐君毅；其二：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①。学界通常以梁漱溟和熊十力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之所以以此二人为现代新儒家的开端，

^① 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1~57 页。

不仅因为他们属于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以后)中的人物,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理论与康、梁、谭、章有着明显的不同(进步)。后四者一生的志趣在政治,在理论建构上往往比较粗疏,尤其在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上缺乏可圈可点的建树。而梁与熊其一生基本是以学术活动为核心,在文化与哲学理论上颇有建树,其政治主张也是建立在他们相对完备的文化与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尤其在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上各有独到之处,并直接影响了其后现代新儒家理论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的真正形成是以1958年《中国文化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其代表人物以第二代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主^①。现代新儒家的学术宗旨是“返本开新”。“返本”即是返回儒学之本。而儒学之本在现代新儒家的主流论说中就是从孔孟到陆王的心性之学、成德之教。“开新”即是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而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民主是科学的保证,因而民主是主,科学是次^②。因此,用最简约的话概括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就是“从德性开出民主”。

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自由与权利观念基础之上的。现代新儒家普遍认为,儒家传统思想及其德性观中包含了自由与权利观念,因而只要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中积极成分,就能

① 张君勱在现代新儒家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在1949年后不像梁、熊二人留在大陆,而是活动于国际之间并最后定居美国。他属于第一代,但与第二代人物共同发起了《中国文化宣言》活动。他自称“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自期“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因而其思想的政治性较其他新儒家人物更强。由于篇幅等方面的原因,本书将不涉及他的思想。

②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6~22页。

开拓出民主政治。持这一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牟宗三。牟继承熊十力“体用不二”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并用它改造了康德的道德形上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也即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按照他的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儒家的道德本体即仁心,是集认知、直觉与实践功能于一身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因而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由此批驳了黑格尔关于中国古人无主体自由的观点,认为儒家的德性修养中包含了很高的主体自由精神。道德本体既可以向上发挥直觉与实践功能从而成就道德的自由,也可以通过“自我坎陷”向下转出认知的功能从而成就政治的自由。就民主政治本身而言,牟宗三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并不缺乏民主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尽理精神”、“理性运用表现”等特点,使得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主精神只能在“治道”中以德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民主政治建立的关键就在于道德本体通过自我坎陷向下转出“分解的尽理精神”和“理性的架构表现”。通过这一坎陷,即可在政道上建立起民主政体——将民主客观制度化。政道上的民主政体即可保证治道上民主精神的有效发挥,此即将人治、德治形式转化成法治形式。

唐君毅将人类自由划分为八种类型^①,其中包含了个人主观自由、客观的政治自由(权利自由)、意志的自由和道德境界的自由。他认为道德境界的自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而这一自由只存在于中国儒家,即孔子“为仁由己”的自由。“为仁由己”的自由不仅高于其他各种自由,而且还包含它们。因此,儒家

^①《唐君毅全集》第五卷《人文价值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330~345页。

的道德的内在自由中实际涵摄了政治的外在自由。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唐批评西方以法治维持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民主政治,因为人们之间对权利与自由相互尊重并非出于衷心,而是出于利益上的考量。在他看来,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性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相互尊重权利与自由,不是出于权利欲望,而是出于道德良心或纯粹的道义。由此,他提出应该用中国儒家的德治和礼治弥补西方法治消极性、被动性的不足,同时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之人治的弱点也由西方的法治来克服。这样,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政治就是:德治+礼治+法治。

徐复观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心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心”就是儒家的恻隐怵惕之心或曰仁心。仁心使人摆脱了一般动物性的自然奴役状态,也使人摆脱了宗教性的超自然奴役状态,还使人具备了平等的基础。因此,仁心就是自由的主体。孔子是仁心的发现者和弘扬者,由此也是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者。因此,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如果在政治上正常发展,必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这种由儒家心的文化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还要超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因为它是建立在人类最高理念“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所以,民主政治只有接受儒家思想才能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总之,现代新儒家普遍认为,儒家内在的德性自由中蕴涵着外在的政治自由,儒家所预设的人在德性修养上的平等基础(人皆可为尧舜)蕴涵了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儒家的德性精神不仅不与西方民主精神相悖,而且还能发展出超越西方功利主义的民主政治——道德理想主义的民主政治。

但是,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理路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主要在于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眼光忽视了对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道德理性与政治理性之间的真实关系的考察,对儒家传统德性观自身的弱点也缺乏正视,同时也忽视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历史性。

首先,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是一种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关系。作为一种内在自由,道德的自由既可能是积极自由,也可能是消极自由。当道德的自由表现为自由意志为了某一价值理想或目标而积极进取时,它是积极自由。但当道德的自由意志在遭受到现实的挫折时,很有可能消解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准则或价值观念,转而追求一种超现实的心灵境界,此时的道德自由即由一种积极的自由转为一种消极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自由不仅不能促进政治自由的进步,反而阻碍了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中国宋明儒家中的一些人物为“内圣”而“内圣”的道德追求和西方近代法国大革命后一些本来热衷于政治的人士转而追求内在自由^①,都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本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道德权利是指在人的道德观念中所肯定和维护的人的基本权利。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在西方法学中表现为自然法与成文法之间的关系。但是,儒家的道德权利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由传统的道德观念所维护的基本人权,如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迁徙权等,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权利。由于儒家的道德修养是超功利的,其中并不包含对人的基本权

^①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8~115页。

利的规定与维护，因此儒家的道德权利实际是一种“道德义务”，这样它便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权利背向而行了。

第三，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道德理性通过“坎陷”或辩证否定即可转出建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论理性。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解和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表达了“合必然性”的内容，也即以实践的形式表达了认识上的规律。但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坚持将辩证法直接应用于实践，认为道德理性在实践中通过辩证开显即可转出认知理性，从而实现民主政治。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性质的“良知坎陷”说，实际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悬设”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第四，现代新儒家只看到了儒家德性精神与民主精神相融合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它与民主精神不相融合的一面。儒家德性精神与民主精神不相融合的一面就是它的理想主义、家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性质。因此儒家德性精神要成为现代政治的一项资源，就必须首先进行一个“现代化”改造过程。

第五，欲更深刻地了解现代新儒家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从儒家德性与政治理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儒家德性观中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其非理性的成分，就是其中通过体认、直觉所达致的“神化”功能和一种超验的、神秘的宗教情怀。对于这些非理性成分，现代新儒家（主要是牟宗三）也一概继承并加以发挥。儒家德性观中的理性成分即道德理性主义属于价值理性范畴，而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并列于政治理性中，二者并不存在谁包含谁、谁转化谁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根本不能相互化约的。

大陆地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注和研究现代新儒